

2024, 以韧性抵御风险

◎ 记者 袁源 王哲希 见习记者 颜凌康

2024年,虽然经济衰退的阴霾并未如期笼罩,但新的挑战层出不穷:抗击通胀的“最后一公里”似乎变成世界上最长的距离——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战,更是一场心理战;人工智能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;气候变化的警钟已经敲响;全球化逆流涌动,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给国

际合作带来了障碍。

这些糟糕的情况并非完全无解。

但是,正如《金融与发展》主编吉塔·巴特(Gita Bhatt)所言,“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——从全球变暖到人口和技术变革——无法通过各国单独行动来解决。”

那么,突出重围的路在哪?

In 2024, although the shadow of economic recession did not arrive as expected, new challenges are emerging constantly: the "last mile" in the fight against inflation seems to have become the long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—this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battle, but also a psychological one; the wa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weeping across the globe at unprecedented speed; the alarm bells of climate change have already sounded; and the currents of de-globalization, protectionism, and unilateralism are rising, creating obstacl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. These dire situations cannot be resolved through unilateral actions by individual nations.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s the cornerstone of global governance.

风险与韧性并存

当前,各国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、不确定性更高,但又充满机遇的全球经济环境。

“在经历了疫情、冲突、通货膨胀和货币紧缩造成的动荡四年后,全球经济增长似乎正在趋于稳定……然而,增长水平低于2020年之前。世界最贫困经济体的前景更加令人担忧。”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·吉尔(Indermit Gill)直言。

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前秘书长林建海看来,2024年世界经济的特点仍然是“一低三高”,即低增长、高通胀、高债务、高不确定性。“在今后一段时期里,全球经济将呈现世界经济缓慢增长,且不均衡,2024年的出口前景依然高度不确定,在发达经济体,市场利率预期将会下降,但会维持在比新冠疫情前较高的水平,美国经济大概率‘软着陆’”。

2024年初,世界经济论坛发布《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》指出,气候变化、人口变化、技术和地缘政治等“结构性力量”正使世界变得更不稳定。

具体来看,人工智能生成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是最大的短期风险,而极端天气和地球系统关键变化是最严重的长期问题;未来,经济不确定性将继续存在,环境与科技风险严重程度逐渐上升,并成为主要影响因素。

在此背景之下,各国在紧迫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却愈来愈不足。全球三分之二的专家预测,未来十年将形成多极或分裂的秩序,中型和大型强国之间将开展竞争,制定并执行新的规则和规范。

世界经济论坛在《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》中呼吁,“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裂痕,我们需要加强对话。”

不过,在充满了挑战与风险的当下,仍然有一个好消息值得关注——面对生活成本危机、地缘政治冲突、逆全球化趋势与贸易争端,各国经济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。

IMF在其4月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报告中写道,世界经济在2024年和2025年将分别以3.2%的速度增长;世界银行也在其新一期的《全球经济展望》中预计,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稳定在2.6%,在2025年—2026年小幅上升至平均2.7%。

虽然上述预期均低于疫情暴发前十年的平均水平(3.1%),不过大多数指标仍显示经济将实现“软着陆”。

IMF指出,经济增长呈现韧性,通胀快速下行,表明供应形势出现有利变化,包括能源价格冲击正在消退,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供应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实现大幅反弹。

“韧性”之下,“通胀”未消,“风险”犹存。

尽管世界银行、IMF等报告显示,部分短期风险已经消退,但中期脆弱性仍在增加。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记者表示,虽然短期内复苏势头依旧强劲,但长期来看,全球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错配问题日益严重。资源要素的错配可能会抑制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,从而拖累长期经济增速。

IMF金融顾问托比亚斯·阿德里安(Tobias Adrian)也发文指出,最近几个月,金融市场上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,因为投资者相信,抗击通胀之战正在走向“最后一公里”,各国央行将于未来几个月放松货币政策。然而,托比亚斯·阿德里安同时指出,这“最后一公里”可能会起伏不平,各国央行须保持警惕。

“自大流行开始以来,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向IMF请求紧急援助,IMF向困境中的经济体的贷款在2022年飙升至创纪录的1400亿美元。尽管传统应对通胀压力的措施是提高利率,但这带来了经济收缩的风险。”英国Z/YEN集团首席执行官麦克·沃德(Mike Wardle)认为,通货膨胀、经济衰退、债务危机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。

中国,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,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。对内,中国正深化改革,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;对外,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,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中国的发展不仅关乎自身,更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。

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衰退中“幸免于难”,中国经济也实现了平稳开局。

今年以来,中国主要经济指标超出市场预期,多家国际机构最近纷纷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。联合国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.8%,IMF上调至5%,亚洲开发银行上调至4.8%……

海外观察人士纷纷表示,国际机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,凸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大、韧性足、增长前景乐观。

不过,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,中国也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。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、“脱钩断链”的外部挑战,以及“产业链外迁”“中国制造优势不再”等论调,中国希

望直面挑战、良性竞争,在变革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。

“扩内需”“稳外贸”成为中国加快释放经济潜力的两大关键词。

一方面,通过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,促进消费需求释放。对内增加就业机会、提高工资水平、扩大社会保障,提高居民购买力,增强居民消费意愿;对外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,推动消费结构升级,通过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,扩大进口品种、提升服务业水平等举措,丰富消费品种,提高消费品质,满足居民消费需求。

另一方面,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波动,中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,以电动载人汽车(新能源汽车)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“新三样”为代表,中国外贸展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。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,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,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孙晓认为,随着中国经济运

行整体回升向好,更多务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发挥效力,外贸企业队伍必将更加壮大,活力也必将进一步增强。

劳动成本上涨的背后,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,但银发经济的机遇也相伴而生。今年初,国务院办公厅发布“1号文”,聚焦银发经济,《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》成为我国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;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也提出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”“大力发展银发经济”。老年食堂、短期托养、居家照护等名词正在深入人民生活。

“推动银发经济发展,可以通过激发老年人的消费需求,扩大银发产业投资,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等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表示。

此外,推进基础设施建设,促进区域间互联互通;发展特色产业、特色经济;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

条件,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……中国正在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,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。

国际方面,全球贸易摩擦加剧,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,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挑战,也促使中国加速经济结构调整,提升自主创新能力,推动高质量发展。

具体来看,中国一方面通过与美国进行多轮高级别贸易谈判,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,减少关税壁垒并扩大自美国的进口;一方面积极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,通过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等扩大贸易伙伴和投资领域,增强经济韧性;同时,进一步开放市场,改善营商环境,吸引外资。

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正在变得愈发紧密,面对挑战,中国并不能够“独善其身”。不少专家强调,中国经济的稳定和积极增长对跨国企业经营有好处,对地区合作与发展有好处,对全球经济恢复有好处。

挑战中寻找机遇

多边框架是未来

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,各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往往具有全球性。

尽管目前逆全球化抬头,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基础陷入困境,但多边机制的作用不可替代,多边主义制度体系才是全球治理的基石。

麦克·沃德指出,除了IMF,世界银行,还有其他国际组织正变得举足轻重;金砖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框架,通过货币互换提供流动性;非洲联盟一直在讨论建立非洲货币基金;二十国集团(G20)尤为关注国家债务管理。

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乏力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,再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压力,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。

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可避免,但这些糟糕的情况并非完全无解。

IMF就提出,今后,政策制定者应优先采取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全球经济韧性的措施。

第一,重建财政缓冲。可信的财政整顿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,改善财政空间并增强金融稳定。

第二,扭转中期增长前景的下降

趋势,促进更快、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有助于提振增长。

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,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本国和外国直接投资,以及加强国内资源调动,将有助于控制借款成本并减少融资需求。此外,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年轻人口,必须努力改善人力资本,在其他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。

此外,还需利用人工智能的潜力,并扭转地缘经济割裂加剧以及贸易限制措施和产业政策措施激增。

第三,过去几年的一大成就是加强了货币、财政和金融政策框架,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。这帮助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,避免了持久性通胀反弹。

最后,绿色转型需要大规模投资。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绿色投资一直在稳步扩大。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现在必须做出最大努力,大幅加快绿色投资并减少化石燃料投资。为此,其他发达经济体和中国需要进行技术转让并提供大量私人

和公共融资。

在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,多边框架与全球合作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。

在全球范围内,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不断被强调。因为单一国家的政策调整难以解决全球性问题,并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速度不一,政策取向也各不相同,这种不平衡凸显出全球经济进行更紧密政策协调的必要性。

“根据IMF的一项研究,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可以增强经济增长和稳定,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。通过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,各国可以吸引外国投资,进入全球市场,并利用新的融资来源进行发展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。”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·尼赫鲁大学教授叶文(Aravind Yel-ery)向记者表示,实现同步金融发展需要政府、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行动和合作。

这其中,货币政策协调是关键。

各国央行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政策

目标,往往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,但这些政策差异导致了汇率波动、资本流动变化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复杂化。

麦克·沃德指出,自国际货币秩序最初构想以来,发生了重大变化,其任务范围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,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发展,导致IMF开始提供对世界和各国经济的监测,评估各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方面的适当性。

目前,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偏差,欧洲央行三年来首次降息,加剧了与美联储的政策分化。如果欧洲央行进一步降息而美联储按兵不动,将可能推低欧元对美元汇率,推高进口成本和欧元区通胀率。

成功的货币政策协调常常伴随着财政政策的协调,这不仅要求本国国内两项政策加以配合,也需要各国之间同时协调他们之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,保证一国经济政策的目标顺利实现。

